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皇帝心太偏

清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巳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元1730年9月30日上午十点左右,北京发生了一场地震。这场地震有6.5级,震级既低于两年前的汶川地震,也低于最近发生的玉树地震,但是当时北方平民住宅多为砖土墙承重,没有立柱,没有斗拱,墙壁一晃,屋顶就塌,所以造成的破坏并不小。据震后统计,在这场地震中死亡的人数至少在两万,倒塌的房屋则超过七万间。



李开周,职业撰稿人,编剧,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地震发生时,雍正皇帝正在圆明园里搂着妃子做春梦,而圆明园恰好就在震中位置,所以雍正很幸运地做了一回“地震亲历者”。还好他睡得沉,龙床刚刚晃了几晃,他就惊醒了,一眼瞧见天花板上的藻井正在簌簌落尘,立马大叫一声“地震了啊”,没穿裤子就逃了出去,一头钻进圆明园里的一条龙舟上,坐等侍卫前来护驾。

这雍正大难不死,心有余悸,第二天招来大臣安排灾情调查和灾后重建,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固宫殿,以免被更大的地震弄塌;第二件事呢,自然是让顺天府给受灾的平民发放生活补贴和建房补助。雍正大笔一挥,批了建房补助二十四万两。当时物价不高,银子的购买力相当厉害,据《中国物价史》记载,雍正八年一两纹银能在京城买下两石大白米。您知道,清朝一石米能有一百五六十斤那样子,两石米至少三百斤,现在买这么三百斤米要花六七百块钱吧?

所以当时一两银子至少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二十四万两则相当于一亿四千万。

然而这一个多亿建房补助并没有让全体受灾群众受益,雍正皇帝心太偏,救灾时只管满人不管汉人,二十四万两银子全部分给了满洲八旗,不论受灾与否,全按人头均分。当时驻京的满洲八旗共有八万人,每人能分三两银子,换算成人民币,大约等于一千八百块钱。一千八百块钱用来建房当然不够,雍正大笔又一挥,凡在京官员和八旗兵丁,每人再多发半年工资!至于那些本来比官员和旗人要穷得多,尤其需要救助的普通市民,雍正并不管,他老人家在圣旨里发出号召:“值此灾伤之年,老百姓当尽力于殖产,以资生息。”意思就是你们得学会自救。

灾后重建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事儿,需要花很长时间,这场地震结束之后的第五个年头,雍正暴毙,乾隆登基,新皇帝微服私访,发现京师民宅尚未修建整齐,非但小胡同,连一些临街商铺仍处于倒塌状态,于是他也发了一道圣旨:胡同里的民宅先不管它,临街商铺必须抓紧时间修整一新,不然“观瞻所系”,影响市容。即着步军统领前去调查,凡属于旗人资产的商铺,一概由国家出资重建,不属于旗人资产的商铺让业主自己去修,如果业主无力修整,则由朝廷作价补偿并收归国有,完成重建后再分给旗人。

乾隆这一招儿很高——本来旗人繁殖过快,原先圈给他们的地盘已经不够住了,趁这回灾后重建,顺手再拆迁一批民房,正好能给旗人腾出地方。

附注:此文参考了《雍正实录》卷97、《雍正实录》卷98、《乾隆实录》卷80以及《中国物价史》第九章。

上课

赤手空拳去教室,衣服口袋里装着一只拇指大小的U盘,那是我唯一的道具,像武林中人身怀暗器,该是飞镖或梅花针之类。从窗玻璃前走过时,顺便照了一下面孔,发现两片嘴唇由于长年累月地说话,已经磨薄了许多,这给那原本就不太本分的面相又减去了不少厚道。一大屋子的人等在那里,我放下大屏幕,开了投影仪,启动电脑,把U盘插入机器,拖动鼠标,像个熟练的操作工。接下来我感到胸腔里的某个按钮被打开,单调的声音开始敲打着桌面和墙壁。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获过《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奖等。

继讲过同性恋的惠特曼、王尔德、兰波和洛尔迦之后,我曾经说,“同学们,对不起,这节课又要讲一个同性恋诗人:奥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大半学期过去了,济慈25岁死于肺病,彭斯37岁死于贫病交加,叶芝害单相思,狄金森与人类隔绝,洛尔迦遭枪杀,惠特曼瘫痪,里尔克无家可归,茨维塔耶娃上吊,阿赫玛托娃失去丈夫儿子,艾略特长期禁欲,庞德入疯人院,布罗茨基流亡,米沃什出走……而这天,窗外零下13℃,西北风4-5级,气压偏低,有雨夹雪,如此阴冷之日,我开讲塞尔维亚·普拉斯,她在离异之后开煤气自杀,那一年的冬天是伦敦最冷的冬天。等到学期末,我将作一个这样的总结:“几乎所有诗人都下场悲惨,大家莫效仿,要学只学华莱士·史蒂文森,既写诗,还能做律师和保险公司董事长,最差也要像弗罗斯特那样长寿,给总统献诗。”我还会强调一下,“女生们更要注意了,千万别找男诗人结婚。”

讲塞尔维亚·普拉斯那天,整整一天都心情抑郁。下课后,缩在班车一角,望着窗外灰蒙蒙的街市,浑身无力。我想她死的那天,一定也是这样,一个没有阳光了无生趣的三九寒天,这

样的天气是一个负面的暗示,是一种不好的鼓励。等下了班车,回到家中,锅灶冰冷,饿着肚子倒在床上,一动不动,万念俱灰,感到自己的情绪正临着一个警戒线,正处于某种危险的边缘。那本厚厚的希尔德·普拉斯诗选就放在写字台上,我只要稍一侧身,就能远远地望见它的封面和书脊,上面“Sylvia Plath”是用鲜红美术字体印出来的,衬在洁白纸页的背景之上——这使我联想起关于她的那个电影,她自杀以后,被抬出寓所,背景是伦敦的茫茫白雪,她身上覆盖着一块鲜红的布,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血的颜色,是生命也是死亡。此刻这本诗集的封面似乎在重现那样一个临终的特写镜头。抛开性别立场,仅从文本来看,我并不见得多么喜欢这个女诗人的诗。可是她对死亡的决绝选择一直让我心中发紧,使我呼吸急促,不敢轻易发言。她已经以她的死超越了诗歌,她的命运给人们造成的冲击比诗篇造成的冲击更大,或者说她的命运与诗歌原本一体,无法分开来谈论,她以死亡参与了创作,她的死是她的诗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说并没有贬低她的意思,也许这正是她高于其他诗人的地方。那天剩下的时间,天气持续阴冷,呈死灰色,像患了绝症的人的脸,我的情绪也一直沉浸在早上上课讲这个女诗人所带来的副作用之中。我劝自己,等太阳出来,情绪或许就会好起来的,还有,以后应该刻意选择春光明媚或秋高气爽的日子来讲她,在恶劣天气里来讲这样一个命运阴冷的诗人,无异于雪上加霜。

一个原本为了谋生的职业,由于恰好与兴趣和情感相通,使人怎么都无法将它仅仅当成一个饭碗来应付,从事它的人既兴奋又疲惫,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这门课的课件除了必要的资料图片,表现手法较少变幻。我以为没有必要把课件搞成动漫,咣咣当当像跑火车,弄得跟运动会开幕式那样盛大。还有,这门课里所涉及到的绝大多数诗人的命运本身都已经够令人唏嘘了,无需配上缤纷图案来装扮,就能像一束强光刺痛我们庸常的神经,他们的诗篇亦无需任何绚丽花边来修饰,就能把单调的白色屏幕照亮。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新下乡记

前些时候,天津郊区的一位朋友请我到乡下转转。他与朋友承包了1500多亩农田,准备搞成农业观光生态园,让我帮他做个整体规划,并协助他推广运作此事。那片地方交通位置不错,在津蓟高速与京津高速之间,距天津市区不算远,距北京约一个小时车程。

坦率地说,天津市周边的农业观光项目不仅少,而且搞得也比较晚,相比北京至少落后五六年吧。近些年来,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眼看乾坤》、《生命的百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45集纪录片《兄弟》。

北京郊区尤其是顺义、怀柔、密云、平谷、昌平等地的农业观光项目真的是如火如荼,相当火爆,北京市民一到周末就会开车去这些地方,钓钓鱼、采摘些鲜果、吃一顿农家饭,有的还要住一两晚。像怀柔的“虹鳟鱼一条沟”早已名声在外,每到夏秋季节,沿途私家车不断,顺着山沟,无数农家院内都是宾客盈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少城里人还到那里

投资建酒吧、山吧之类的服务设施,把一条山沟经营得如同“三里屯”一样火热。

当然,北京周边的这些农业观光区比较得天独厚,一是从北京城到这些地方交通比较便利,车程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二是这些地方多是山区,本来就有不少自然风景可供欣赏;三是北京私家车主不少,很多人习惯周末一家出游散心;另外,北京还有一些专门组织郊区游的公司,已经把农家游作为其中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在北京生活的画家也是比较酷爱农村生活的,像宋庄这地方,还有798外的环铁艺术城、机场路沿线的艺术村等,都是那些漂在北京的画家们聚居的地方,他们一般在村里租个小院子或者大仓库,然后就在农家院中画画、生活。没想到,他们的到来带动了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许多村民便开始经营相关的各种

生意。

前两年,我的一位朋友也被一个项目吸引到浙江乡下,帮当地人打造一个乡村旅游景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更好,有成片的竹林、桂花林、山林、茶园,还有小庙、农舍等,当地的农民早就种不田,不砍柴了,而是经营起饭店、旅店,在旅游旺季以接待城里的游客为生。我的朋友说,再过两年,那里的游客会更多,相应配套的酒店、别墅等项目也在规划中。

多年前,我就听说作家韩少功在湖南乡下建了一栋房子,每年不定期地到那里住一段时间,休养、思考、写作。他呆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湖南汨罗,早些年他曾从长沙下放到那里当知青,当时肯定是不待见,而且乡下的生活也很艰苦,几经磨炼,倒是让他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素材,最后写出了不少让他成为知名作家的作品。而后来再度回到那个叫八景洞的地方,则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在那里,他怡然自得地像农民一样生活。据说,他现在已经成了当地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许多人到那里去游山玩水,也顺便参观一下他自建的“梓园”。

如今,不少年轻人经常在网上玩一种种菜、偷菜的游戏,但对真实的菜园子却似乎并不熟悉和了解。在北京、广州等地,不少城里人干脆跑到郊区,租一块货真价实的菜地,种点新鲜蔬菜,周末带着家人到这小不过5平方米,大不过10平方米的菜园,园圃,锄锄地,浇浇水,收收菜,其乐融融。看到他们在地里耕作的模样,很多人都想不到他们都是城里事业有成,生活无忧的“成功人士”。我有位朋友就成了这其中的一员,在郊区每年花1000元租了一小片地,隔三岔五带着老人、孩子去那里整整菜地。

如此看来,在大中城市日益扩张,众多乡下人忙着进城的今天,“下乡”似乎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不过,我觉得如今靠近大城市的乡下还是比较占便宜的,有大量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偏远地区的乡村就不太好说了,如果下乡去的是大中城市的周边地区,那还是令人愉快的。我相信,下乡是人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就像前些时候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个叫卢安克的德国人跑到中国广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中免费教当地学生,一教就是好几年,他却非常满足。因为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

传销倾城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移居这座海边小城之后没多久,新认识的朋友H一天欲言又止地说:“你——是不是搞传销的?”我蒙住了,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疑。

原来,此地靠海,前几年附近发现油田,划出一个开发区后,先是骗子和冒险家大批杀到,随后,大批传销界人士进驻,前脚去了后脚又来。

我顿时想起许多一直被我忽略的细节来。住进小区没多久,派出所和居委会得到线报赶来,说是要登记流动人口。进得门来,却只是草草地问了几句话。临走,居委会的大嫂突然掉过头来,语重心长地说:“千万不能再搞传销啊!”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紧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还有一次,在饭馆吃饭,老板娘听到我的外地口音,突然拔高声音跟边上的人说:“你说传销都这么臭了,怎么还有人要搞!”

我问H我哪里像搞传销的。他答,第一是说普通话,租房;第二,本地人喜欢穿运动衣、T恤,搞传销的多半穿西装、衬衣,还打领带。我符合第一条就不必说了,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件灯芯绒西装!我说:“我甚至都没卖过一管牙膏给你!”他如释重负:“你都说

了你不是,那肯定不是。”说什么就信什么,民风还真淳朴。但我还是赶紧买了运动衣,努力在着装上向小城居民靠近。

从此我多了一双发现的眼睛,留心观察穿西装的人的一举一动。没多久就发现,小区路口那个“卓越中心”,其实是个传销大本营,夜夜有人讲课,还有一个架子,摆满了形状可疑的瓶瓶罐罐。

有天晚上散步回来,发现对面的小旅馆也被租下了,正在开大会。我赶紧凑到窗前,一边胆战心惊回想新闻里“非法拘禁”、“从窗户里丢纸条求救”那样的字句,一边偷偷往里看。最大的一间屋子里,挂了“祝贺某某晋升为地区经理”的横幅,三四十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女,正在有节奏地鼓掌、喊口号。散会后,所有的人还留在现场谈心。一个年轻的男孩兴高采烈地向几个女孩展示幽默感,女孩们乐得哈哈大笑,分明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样子。

又过几天,看见公安和工商押着六七十个年轻男女,拖拖拉拉走了半条街,赶紧围观群众询问。答复:“搞传销的!”

我就这样生活在了传销的阴影之下。前几天我的电磁炉坏了,朋友M带我去他舅妈店里买了一个新的。店外的广场上有许多卖风车的摊子,红红绿绿,做背景再好不过,我摄影兴大发,要他站到风车前拍照,他扭扭捏捏不肯就范,说:“你说普通话,拎着一个电磁炉,还这么好奇,真的很像刚来这里安营扎寨搞传销的。”